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要主动作为

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良好的营商环境需要政府清晰、透明、高效的监管——既要进行有效的监管,保障市场的健康运行,又不对企业发展设置不必要的障碍,减轻企业运营的成本。只有切实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营造出一种公平、公正、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才能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新年伊始,滑雪胜地亚布力“滑”进公众视野。在一段热传视频中,亚布力阳光度假村董事长毛振华满腔悲愤地控诉了自己在亚布力“被欺负、被愚弄”的种种遭遇,矛头直指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

这个控诉不一般。身为亚布力阳光度假村董事长的毛振华,不仅是全国著名企业家、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既有企业家的精明练达,又有专家教授的理性儒雅,这样一位“高人”通常不会轻易“发飙”。如今,“反常”竟然出现了。错愕之余,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样的“欺负”与“愚弄”,让毛振华不计后果“挺身而出”?他对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的“指控”是否属实?

事已至此,该是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出来说点什么的时候了。综观视频内容,毛振华对相关事项的叙述还是清晰的——“非法侵占”亚布力阳光度假村23万平方米的土地,拿去搞假招商,等所谓民营企业建完相关设施后再以经营不善为名收回;以执法为名干扰亚布力阳光度假村正常经营;强买强卖,用执法机构实施“拦截”“威胁”,让旅行社只能到“他们那里”,不能到“我们这里”;利用政府扶持企业的政策,耗费国家巨资建设“非法”的栈道,花巨资搞的“三山联网”也有名无实。

诸如此类的“指控”信息量不小。鉴于毛振华的控诉已经由网络空间进入舆论场,并迅速成为一大热点议题,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不但不应保持缄默,而且理当在

第一时间做出回应——饱含诚意的回应。据报道,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环境整治办、省政府企业投诉中心已赴亚布力展开深入调查,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领导也正在开紧急会议商量应对之策。想必,相关方面很快就会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

但愿,这个事件只是一场误会,经由充分沟通,最终达成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其实,对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而言,及时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固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认真省察一下自己的治理能力与品质,进而为下一步的工作找到正确的方向。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滑坡严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营商环境欠佳。良好的营

商环境需要政府清晰、透明、高效的监管——既要进行有效的监管,保障市场的健康运行,又不对企业发展设置不必要的障碍,减轻企业运营的成本。只有切实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营造出一种公平、公正、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才能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这样的道理不难明白,但做起来并不容易,需要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三思并践行。

当然,在积极回应之外,当地相关部门也有必要思考一个问题,是否弄清楚招商引资是为了什么。企业自然有企业的经营目的,但企业引进来、发展好,更能为当地发展提供动力。相比遭到“指控”被动接招,当地相关部门更需要主动地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售卖“专著挂名”搅浑了道德清水

一家之言

唐伟

2017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职称评价应摒弃从前“一刀切”的方式,提出不唯资历、不唯学历、不唯论文。然而,记者近日暗访发现,在久被诟病的“论文经济”视野之外,部分高校教师为评职称争相买图书专著“挂名”的风气逐渐兴盛。围绕着图书专著的“挂名”,从内容代写、主编挂名到代购代销,形成一条灰色利益链。(1月2日《北京青年报》)

为评职称“花钱代购”发表论文或者专著,竟然成了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达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催生了“论文经济”的繁荣。由此带来的弊端主要有两点:一是吹大了学

术泡沫;二是大量的学术造假导致极大的法律风险和道德危机。

职称改革“三不唯”原则,不失为对既有问题的正面回应,也是以改革除顽疾的对症下药。不过,路径一旦形成,就有强大的惯性与冲力,很难真正摆脱既有的路径依赖。买图书专著“挂名”的做法,从本质上讲属“学术造假”,是一种极端不道德的行为。至于商家打擦边球的做法,是否构成非法经营则另当别论。

当然也应看到,对于“挂名”风气逐渐兴盛的造假行为,职称改革并不是唯一的出路,或者说,职称评定的“论文要求”并无原罪。论文作为学术成果最直观的表现载体,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用论文去评定一个人的学术成就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相比于国内,一些国家学术造假的现象之所以相对较轻,根

本原因并非利益诱发动机出现了问题,而在于惩戒和约束体系发挥了强大的限制功能,简单来说就是造假的成本太高,触发了个体的道德耻感并让其望而生畏。

在对待学术造假上,简单的个例处理就可以看出国内外的差异。比如2014年,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张世友涉嫌抄袭论文10篇,学校作出了解除张世友教授岗位的聘任,撤销其校内所有学术职务和学术称号并调离教学工作岗位的处理;而同年,日本“学术女神”小保方晴子论文造假案曝光后,除了她本人被开除并退还研究经费、人工费以及验证实验的费用,她的导师笹井芳树也不堪忍受舆论压力自杀身亡。

调查发现,“辞去行政职务”或者“暂停招生资格”是国内高校处理学术造假的通行做法,比如重庆大学教授刘洪彪论文剽窃,最终的处理意见

是作出深刻检讨并被免去相应的行政职务,复旦大学对三起学术论文抄袭的处理也采取了相似的手法。而在美国等国家,造假者将会被开除并被纳入“黑名单”,面临长期禁止从事教师业务甚至终身禁教的风险。

公开售卖“专著挂名”搅浑了道德清水,对此不能迁就纵容,对始作俑者也不能轻易放过。对于泛滥成灾的论文抄袭、剽窃等造假行为,加大道德的惩戒力度显得尤为必要,利益天平失衡则无法起到反向抑制的效果。对于学术造假的不道德行为,可以效仿国外的经验,采取零容忍的原则,对造假者直接开除并纳入黑名单,同时发挥诚信体系的惩罚作用,使之陷入寸步难行的境地。再辅以舆论谴责与经济惩戒性赔偿,才能真正触及人心的道德耻感,达到“不敢、不愿、不能”的地步。

媒体视点

基层不需要

“空心笔杆子”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西部某县委办的刘秘书和一众同事却依然在办公室寻章摘句写材料,开年的会一个接一个,无论是写领导讲话还是编文件整报告,想出新出彩,必须让文章合辙押韵,对仗华丽,最好配几句古诗、俗谚、四六句,整个新词,造个新概念。看似文字鲜活了,实则华而不实,经不起推敲。

记者在基层调研中发现,很多地方都有不少如刘秘书一样写材料的人,县委一套,政府一套,委办局也有一套,某科级单位的领导居然也向记者介绍:“这是我们的笔杆子,办公厅王主任。”连科级单位都设了“办公厅”,令人啼笑皆非,基层的文牍主义之盛,可见一斑。

“开门当秘书,关门当领导”。基层的笔杆子,大多集中在办公室、政研室、秘书处(科)和综合处(科)等。这个活的确不好干,一些被领导倚重的笔杆子整天埋头码字,没时间学习和调研,只能从材料中来,到材料中去,在形式上下功夫,久而久之自己也变成了“空心笔杆子”。

“空心笔杆子”多,虚功自然多。西部某地区通讯员传给记者一份某乡实现村村通电的简报,三五百字就能说清楚的事,硬拉到两千多字。如此材料,滋生严重的形式主义、浮夸风气,甚至不乏造假、谎报。

实干不行,材料来补。基层很多地方都偏爱用材料打头阵,工作落不落实,总结要写好,干得好不好,汇报要出彩,用材料“说话”,拿材料“邀功”的现象并不鲜见。在一些地方,有的领导不爱思考更不愿意动笔,笔杆子的用处也就大了。

基层不需要“空心笔杆子”,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泥腿子。基层工作,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只有对在调查中发现的现象、问题进行思考、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报告、发言才能指导实际,才有利于作出正确的决策,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据新华社电,作者张丽娜)

“提税涨价”不是控烟的唯一选项

公民论坛

江德斌

2009年和2015年,我国烟草两次大幅提高税收,卷烟价格随之上涨。然而价格杠杆似乎并未对烟草消费产生实质性影响。2001年到2016年,我国已成为卷烟支付能力增速最快的国家。在一些专家看来,烟草价格的上涨,远远赶不上“烟民”卷烟支付能力的上涨。我国烟草税收占其销售价格的比例已达59%,仍远低于75%的世界平均水平。许多控烟人士呼吁,应该科学提高烟草税收,持续提高我国烟草价格。(1月2日《工人日报》)

按照上述观点,我国烟草税收销售价占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应继续提高烟草税收,进一步达到“涨价控烟”

目的。这个逻辑看似合理,实则有些偏狭,走入了一味依赖提税、涨价的死胡同,却忽视控烟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采取综合手段多方位控烟。“涨价控烟”并非不可行,但不是唯一选项,以避免患上提税涨价依赖症。

我国控烟工作已有十多年,但成绩乏善可陈,烟民不降反升,全国性控烟法规迟迟未能出台,公共场所全面禁烟难以执行,很多城市一年下来,也开不出几张禁烟罚单。烟草广告虽然被全面禁止,但烟草企业通过设立文化公司、捐赠慈善等,变相宣传企业品牌而打“擦边球”,导致烟草广告依然潜流暗行。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警示文字和图片要占烟盒包装面积的50%以上,我国已在2003年

签署《公约》,但至今都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2015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中,成人对吸烟导致疾病的认知依然十分低下,能够全面认识到吸烟导致的4种疾病的,城市仅有16.1%、农村更是不到8%的人。影视剧里的吸烟镜头仍然很多,普通火车车厢内还能吸烟,公共场所禁烟区仍有很多人吞云吐雾等等,均说明我国控烟道路还很艰难。

显而易见,在这些最基本的工作都未能做好,全社会控烟环境并不理想之前,想依靠提税涨价来达到控烟目标,很不现实,除了增加税收之外,很难达到预期控烟效果。我国烟草已于2009年、2015年两次大幅提高税收,卷烟价格随之上涨,可烟民不减反增,烟草消费也在持续增长,可见单纯靠“涨价控烟”是不够的,即便将烟草税

收比率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其它控烟因素都不改变的话,最终也不会有太好的成绩。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烟草税确实比较低,可那些控烟做得较好的国家,其经验不是提税涨价,而是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丑化烟盒、禁止烟草广告、科普宣传、影视剧禁烟、公益诉讼等各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拥有广泛的社会控烟基础,才取得了现在的控烟成绩。

我国控烟工作要想真正实现突破性进展,就应面对现实,吸取国外控烟经验。真正落实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法规,烟草公司去行政化,将控烟工作交给卫生部门,兑现对《公约》的承诺等。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不渴求一步到位,才能将控烟工作做扎实。

投稿信箱:qilupinglun@sina.com